

● [日] 香川孝志 著
前田光繁



● 赵安博 译
吴从勇



路军内日本兵

解放军出版社

K269.5
11-3
2

B(22)24

八路军内日本兵

〔日〕 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 著
赵安博 吴从勇 译



E

214071

八路军内日本兵

〔日〕香川孝志 著
前田光繁

赵安博 译
吴从勇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5.75印张·85000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59 定价：0.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东京出版发行后，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作者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抗战初期被八路军俘虏，经过学习后，他们从日本军队的欺骗宣传“宁可死后当一名护国之神，也不要活着受俘虏的耻辱”中觉醒过来，成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士兵反战团体的负责人。书中系统而真实地叙述了当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和他们参加八路军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情景，反映出了他们的苦恼与欢乐，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本书是普通日本士兵的不平凡的经历。



本书译者之一赵安博（左）和本书作者之一前田光繁（右）一九八二年八月，在北京交谈。



赵安博（左三）和本书作者香川孝志（左二）、前田光繁（左四）一九八二年八月，座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活动情况。

作者简介

香川孝志（别名梅田照文），一九一五年出生于日本德岛县。他在一九三七年国士馆专门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八年被征到中国华北作战，一九四〇年八月被八路军俘虏。后来他参加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从事反战活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为止。

一九四六年一月，他回到日本后，任《赤旗报》记者，在日中贸易促进会、亚细亚通讯社、大地报社工作，一九七〇年任向阳社常务、董事，后又任社团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对日中科学技术交流作出过贡献。他战后一直负责有关中国方面的工作。

前田光繁（别名杉本一夫），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京都。他在京都市立商工专修学校（夜校）毕业，参加海军抵达中国东北。他是满铁有关公司派遣在中国华北的工作人员。一九三八年七月，他被八路军俘虏。一九三九年他正式表明参加八路军，对日军进行反战活动，和其他在华日人一起建立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

日本战败后，为了照顾残留日本侨民，他在中国工作到一九五八年。回国后，他利用工作之余，长期从事日中友好运动。

宝塔山下结友情

——介绍《八路军内日本兵》

日本友人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军内日本兵》一书自发行以来，据说在日本博得好评，许多人，特别是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友人都争着阅读，以先睹为快。我看了这本书，回想起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在延安宝塔山下日本工农学校与日本学员朝夕相处的情景，也感到振奋。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由一九四〇年四月到达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野坂参三任校长，我任副校长。前田和香川来延安时间比较早，在延安工作与生活时间长，又是反战同盟和工农学校的负责人，因此，知道情况多，书中所写的事实也比较确切。

《八路军内日本兵》，涉及的范围广，但我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朴实地叙述事实。例如对于旧日本军队中法西斯教育的叙述，是比较恰当的。本书一方面肯定这种宣传教育，对日本士兵有巨大的欺骗作用，例如书中写道：“对于战前日本士兵说来，最大的耻辱是在交战中当俘虏。”“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了，化为护国之神。”因此，在战斗中有些士兵被捕后，有企图逃跑的，也有自杀的，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本书也指

出，日本军队的广大士兵，从本质上说，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对于日军那一套“皇道史观”的教育，也不宜过分夸大和渲染，只要善于启发，循循善诱，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是能够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接受国际主义的教育，为早日实现和平、民主、改善生活以及中日友好而努力奋斗的。

香川指出：“这一期间促使我们思想和感情发生变化的，是我们接触到的八路军士兵们诚恳的态度。”从晋东南野战政治部到延安的路上，他们看到八路军指战员怎样爱护群众的庄稼、保护群众的利益；看到军队和人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八路军年轻的勤务员替他们打水、打饭，也使他们感动。前田在书中写道：“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奇特队伍，一旦参加之后，就会感到它有一种魅力，使人难以和它分手。”

当然，理论政治方面的学习也能促使他们思想上的进步。前田的文章中谈到日本河上肇教授以及早川二郎的著作对他的启发。在香川的文章中，讲到 he 读了毛主席《论持久战》，感到十分惊异。他说：“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如此卓越的思想家”。

香川对于学习理论更是十分热情，他在一年之间，把何思敬和王学文同志的讲义全部记录下来，并且重抄一遍，共二十万字。一九八〇年五月，他把讲义稿寄给王学文，王委托何思敬夫人王艾英和女儿何理文翻成中文，由求实书店出版。讲义的原件，保存在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内。这份讲义稿正如王学文同志所说的，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本书既讲到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也谈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野坂参三领导下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即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正如本书所作的评价：“这两个大会对华北反战运动是巨大的推动力。”

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貌。提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还提到了留日的老前辈吴玉章同志。由此可见，我们党富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许多负责同志对于日本友人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很关心的。

书中也谈到日本青年怎样和中国各族青年结成友谊的。香川本人就是后来中国驻日公使王晓云的好友。从以上种种历史事实中，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

本书还提到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联合国军在中国的司令官美国史迪威将军同蒋介石闹摩擦的情形。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连外国的将军看了都忍无可忍。书中还介绍了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人员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考察和观感。还以美国人参观重庆国民党政府关押日本俘虏的情景作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发人深省的。

书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联系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包围和歼灭几十万德军；日本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惨重失败；意大利的投降等，来说明日本军队战斗力的削弱以及士气的消沉。根据这些

情况说明，反战运动的开展是很有说服力的。

当然，这本书主要是历史的记录。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正如胡耀邦总书记所指出的，中日两国对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日两国已经进入和平、友好、信任、合作的新阶段。但是历史不应忘记，我相信无论是日本青年，或是中国青年，都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历史，以便更加满怀信心，满腔热情地为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世代代的中日友好作出努力。让中日友谊象长城和富士山一样的万古长存。

最后，有一点声明：这本小书是我和吴从勇等同志共同翻译的。

赵 安 博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六日

前 言

平凡的士兵 非凡的经历

日本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发动的日中战争，于三年后的一九四〇年夏季陷入了困境。虽然日军的占领区不断扩大，并占据了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但实际上他们所控制的不过是点和线，是辽阔的中国国土的一小部分。

一九四〇年八月，部署在华北山西、河北两省铁路沿线的日军遭到了中国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袭击。当时，我（香川）担任守卫桥梁的任务，就在这次战役中，成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时，我是陆军伍长，只有二十五岁。从那天起，开始了我在八路军中的生活。

我昏倒在战场上，成了敌军的俘虏，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南部的小山村里度过了自暴自弃的日日夜夜……后来，渐渐恢复了平静，许多新生事物映入我的眼帘……

对那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人们及其思想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还有那朝气蓬勃的延安生活……。

四十春秋转瞬即逝，但陕北黄土高原的延安风光至今历历在目。

最近，我看了一个青年写的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是二十一岁，象我这个年龄，要是在战争年代，毫无疑问要扛起三八枪奔赴战场，或者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或者自己受伤而死。究竟是什么迫使当时的日本人民不顾自己的生命而卷入这场侵略战争的呢？”这是一个学习日本近代史的学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的疑问。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但对于曾经参与过这场战争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义务作出认真的回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动荡的世界中，使我国避免重蹈侵略他国的覆辙。何况，近来军国主义的脚步声依然可闻，我更应认真回答这个青年提出的问题。

战前的日军士兵，都把在交战中被敌军俘虏视为最大的耻辱。不仅在军队，整个社会都贯输着“与其活着受囚虏之辱，不如战死做护国之神”的思想。只要回想一下太平洋战争末期，集体自杀的

无数悲剧，就不难明白这一严格的戒律如同枷锁般紧紧地束缚着日本人的心灵。

在日中战争中，我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和几百个同样处境的伙伴一起，站到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立场上。参加“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许多伙伴，同八路军一起奔赴前线，对日军官兵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这一举动，在日本军部眼中，无疑是背叛祖国的卖国行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日军捉住，不仅本人难免一死，连在日本的家属也要受到社会的冷遇。

日本军部对日本社会极力封锁有关我们活动的消息。他们对那些直接和反战同盟成员接触过的前线日本兵宣传说：“这些人由于贪生怕死而堕落成为敌人的走狗。”但是，为了早日结束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挽救日本士兵不作无为的牺牲、在前线工作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许多友人，被日军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怎么能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呢？”我坚信、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进行工作，是拯救祖国和同胞免于毁灭，捍卫民族荣誉，建立同中国人民永远友好的光明大道，同时，为这一工作而献身的人们不愧为爱国者。然而，却

很少有人知道在日中战争中有一批从事这种工作的日本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恐怕就无人知晓了。迄今为止,记载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书籍不过二三册而已。

如上所述,日本军部极力想把我们的活动从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抹掉。而战争中的美国却对我们的存在和活动格外的关心。一九四四年,派往延安的美军代表部的成员们,多次走访了我们“日本工农学校”。从一九六二年起,曾任美国驻日公使的约翰·艾默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数年前译成日文出版的他的《暴风雨中的外交官》一书,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他访问日本工农学校时的情景(其中还提到了我,使我感到惶恐)当时,有一位出生在夏威夷的日本后裔有吉幸治中士,常常随同艾默生一起到日本工农学校。他和我们很熟悉,我们对他也是无话不谈。有吉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九七二年,时隔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东京见到了他,那是最后的会面。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日本以后,怀着加强日中两国人民友好愿望奋斗至今。这期间,我曾写过几篇有关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短文,但如此完

整地撰写我的经历还是头一次。我不知道把此文称作“一个平凡日本人的非凡的经历”是否合适。但是，我想读者一定能够理解，我撰写此文绝非单纯为了我个人的回忆。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日本人，有几万人。我知道，这些人中，许多朋友都一致公认，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作风是了不起的。如果我的这篇文章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今后的前途，如能对年轻一代起到某些作用，我将感到欣慰。

出于同样目的，我的前辈前田光繁也写了回忆录，并将和我的文章一起发表。前田是华北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回忆录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我的重点是写延安时期的生活，这真是不谋而合的分工。我想读者通过此书可以系统、全面地了解我们当时的工作情况。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六三年，曾出版《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的记录》一书，其中收录了我和前田及其他朋友的短篇回忆录。这次，在整理我的回忆录时，考虑到现在读者的情况，又引用了该书的一部分内容。今天能

把对我一生最有意义，曾对形成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起过决定影响那一时期的情况，以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下来，使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所崇敬的田岛淳、登美夫妇，从这本回忆录的构思到调查、收集资料，抽出宝贵时间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夫妇的支持，我这本书也就无法问世了。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另外，此书出版还得到赛马尔出版社田村社长的深刻理解和支持。在此，谨向田村社长及该社的生田荣子董事、编辑部的諏访部大太郎、田道希久子等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香川孝志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前言：平凡的士兵 非凡的经历

I 在延安的日子里 香川孝志

- 一、一个普通的日本兵 (3)
- 二、当了八路军的俘虏 (10)
- 三、在山西省麻田镇 (19)
- 四、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29)
- 五、学习与实践的日子 (34)
- 六、窑洞生活的日程与娱乐 (41)
- 七、中国的朋友们 (47)
- 八、遍及各地的反战活动 (52)
- 九、在前线号召日军投降 (60)
- 十、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67)
- 十一、在延安的美国人——艾默生和有吉 (77)
- 十二、学习上了轨道 (87)
- 十三、受欢迎的反战剧《岛田上等兵》 (91)
- 十四、领导人的风貌 (96)
- 十五、为波茨坦公告而沸腾的延安 (101)
- 十六、返回战败的祖国 (104)
- 十七、重访延安 (113)